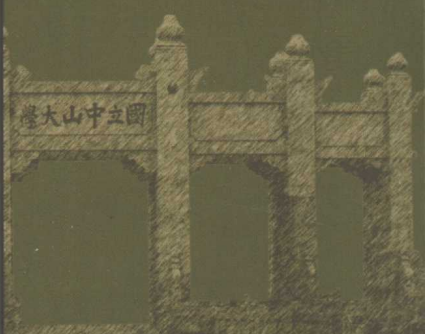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

岑仲勉文集

向羣萬毅 編



● 中山大學出版社

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

向羣萬毅 編

岑仲勉文集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岑仲勉文集/向羣,萬毅編.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1
(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
ISBN 7-306-02400-0

I. 岑… II. ①向… ②萬… III. ①岑仲勉—文集 ②社會科學—文集
IV.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74381 號

責任編輯	佟志
封面設計	方楚娟
責任校對	莫文
責任技編	黃少偉
出版發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編輯部電話(020)84111996,84113349 發行部電話(020)84111998,84111160
地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編	510275
傳真	(020)84036565
印刷者	廣東南海系列印刷公司
經銷者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
規格	635mm×960mm 1/16 34 印張 453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7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廠聯繫



岑仲勉
(一八八六年至一九六一年)



岑仲勉教授在工作

“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總序

黃達人

在中山大學建校八十周年之際，“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出版了。將我校已故傑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已發表和未發表的著作結集出版，這是我們對先賢表達敬意的一種方式，也是我們作為後學的責任。

中山大學八十年的光榮歷史，是廣大師生追求真理與光明，參與社會變革，推動社會進步的歷史；是歷代學人引進、創新、傳播現代科學和文明的歷史；是傑出學人輩出、人才培養繁盛、教學科研精進日新的歷史。在中山大學的發展史上，鑲嵌着一代又一代著名學人的名字，陳寅恪等一批人文大師以他們在文、史、哲等各領域的宏大建樹，奠定了中山大學人文學科的學術傳統，也奠定了中山大學作為中國名校的地位。

在為學上，他們不計名利得失，視學術為天下公器，以學貫中西的遠見卓識不遺餘力地吸收新知識、新觀點，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

在為人上，他們不悔食於自矜，不曲學以阿世，忠於良知，敢於堅持。在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陳寅恪先生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精神的閃光。

他們的精神隨着他們的著作在世間不息地流傳，隨着時間的流逝，披沙見金，更見珍貴。

文庫中所收的著作，在學術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價值，時間已經證明，它們是薪火承傳的中國文化的座座豐碑。這些著作中所體現的學術思想、治學方法乃至學術規範，更是後學者得窺學術門徑、走上學術道路的指南之針。

在這些著作的字裏行間，透露着著作者鮮明的學術個性，同時又有着幾乎完全相同的共性，就是它們無不體現了一種一以貫之的精神：對學術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對人生永不放棄的勇氣。

這種一以貫之的精神，為中山大學營造了良好的學風，豐富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學術傳統，積聚成我們這所大學珍貴的精神財富，給我們這些後學者以無盡的精神力量。

因陳寅恪先生的文集早前已出版多種，尊重陳先生女公子的意見，本文庫沒有編入陳寅恪文集。但我校蔡鴻生教授新近出版了《仰望陳寅恪》一書以及中山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陳寅恪詩詞箋證》一書，可以彌補這一遺憾。

中山大學的理科和醫科同樣是大師雲集、羣星燦爛，理科和醫科的傑出學者文庫也將在適當的時候出版。

我深信，這次出版的“中山大學傑出人文學者文庫”，必可嘉惠學林，裨益後世。

是為序。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八日於康樂園

岑仲勉先生學記

姜伯勤

蒙默先生《蒙文通學記》首篇為《治學雜語》，編輯自蒙先生論學書翰及短箋雜記。今仿此體例，輯錄岑仲勉先生治學語錄數條，略加引論。

桑兵教授近撰《國學與漢學》一書指出：“近代中國學術界名家輩出，形成宋以來學術發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史料大量涌現，承襲清學餘蔭，溝通域外漢學，當在首要之列。”羅志田教授近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論及陳寅恪先生所提出的“今日史學”，“顯然意味着民國史學在學術典範上的新認同，其區別即正體現在‘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而走向‘今日史學’這一新的認同的過程中一些過去較少為人注意的面相。”例如，岑仲勉先生的學術理路，就既反映了國學與域外漢學的會同，又表達了“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的新的學術規範的認同。

岑仲勉先生（一八八六一—一九六一）以字行，名銘恕，又名汝懋，出生於廣東省順德市桂州里村的一戶書香之家，父為前清舉人，伯父師事陳澧，二兄在北京翰林院供職。先生三歲喪父，十四歲前即已於家鄉得受古典教育。弱冠之年，又從二兄游學於京師四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專門稅務學校第一屆（一九〇八·十一—一九一二·十二）。

《陳垣來往書信集》於一九九〇年出版，而我一九八六年八月為《中國史學家評傳》撰寫《岑仲勉》傳時，未及參考。今謹據這部珍貴的書信集，對仲勉先生學術傳記作一補論。

一、“一個人要咬得菜根，方纔能實心教育”：仲勉先生學術生涯的轉折點。

一九三〇年，岑仲勉先生四十四歲，放棄待遇優厚的海關、鐵

道、財政、鹽運工作，而轉向清淡的教育工作，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主持聖心中學教務，一九三七年七月進入中央研究院，時年五十一歲。

一九一二年，二十六歲的岑仲勉先生畢業於北京高等稅務專門學堂，在上海海關工作，月薪二百四十大洋，後來任兩廣都司令部財政科科長、三水鐵路局局長，待遇優厚。但岑先生毅然放棄，決心向學。一九二九年，鄭師許氏在《新聞報》發表《我國學者與政治生活》，說道涉足仕途，“或不甘失足而回頭愈早的人物，便是學術史愈有深造的人物”（桑兵：《國學與漢學》第七頁）。陳垣先生、于省吾先生和岑仲勉先生都是完成了這種轉變的範例。

三十年代初，仲勉先生經歷着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一九三三年歲首，岑仲勉先生將廣州聖心中學校刊第一冊通過劉秉鈞先生寄呈陳垣先生。這本名為《聖心》的校刊，除載有少量中學教務消息外，其餘均為仲勉先生所撰的《課餘讀書記》，主要內容為水經注恒河（印度）注及中西交通史考證，後來多數收入《中外史地考證》一書。

陳垣先生對這位素未謀面的廣東同鄉聖心中學教導主任獎掖有加。他將這部《聖心》分送給陳寅恪、胡適、傅斯年等諸位名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陳寅恪先生致函陳垣先生說：“岑君文讀訖，極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祇有南學……”

三天之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仲勉先生收到陳垣先生來信，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回信說：“奉十二月二十日惠書，交陳君寅恪手緘，獎譽備至，慚汗交並。”又云：“《聖心》業即續寄十部，想早登記室。陳君緘附繳，便祈代達感意也。”

陳垣先生獎譽仲勉先生的信今已不見。但當年讀過這些信的聖心中學同事馬國雄先生，後來曾在香港出版物中回憶道：陳垣先生“遂親筆致書於岑，其大意則云：寄來聖心校刊……得見尊著……考證明確而精審，珠江流域有此出類拔萃之學人，真可為吾鄉揚眉吐氣”。

著名中外關係史專家韓振華先生，一九四八年頃曾跟隨岑仲勉先生治學。一九九二年七月，我在廈門大學向振華先生談到前

述的故事。韓先生說，當時胡適之先生喜歡研究《水經注》，他也讀到岑先生在《聖心》上發表的《水經注》恒水注（印度恒河），也說了贊揚的話。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岑先生致陳垣先生函云：“惠于文襄手迹乙冊，已拜領並謝。內有涉《水經注》者二條，似足證實東原之攘竊公案也。”足證當時《水經注》也是岑先生關心的焦點話題。

總之，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間，仲勉先生得到陳寅恪、胡適、傅斯年等大學者的激賞，終於從廣州聖心中學教導主任、上海暨南大學校長秘書兼文書（一九三四·八一—一九三六·九）、陝西省禁烟督察處潼關事務所職員（一九三七·四）等職位轉變成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三七·七）研究員。

在前述四十一封書札中，我們看到，由於陳垣先生的引薦及陳寅恪先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組主任）的激賞，傅斯年所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上海約見先生，十二月岑先生又去南京面見。一九三六年九月，岑先生記“孟真（傅斯年）先生適有書來寄下拙著單行本，傅先生意仍主勉入教育界”。可知其時傅先生雖幫岑先生在史語所發表文章，但對接受其進入史語所仍是猶豫的。一九三七年五月，傅斯年所長在陝西一火車站約見岑先生，“聘書聞下月乃可發，研究計劃須與主任商定。寅恪先生常見否？”可知主任即寅恪先生，則二陳先生在促成此事中作用巨大。

六十年後，當我們重新回顧陳寅恪先生、陳垣先生、傅斯年先生這些大學問家提携一位中學教導主任進入史語所時，令人十分感動。也應該注意到，三十年代著名中學的教師，也是備受尊敬的職業，呂思勉先生、錢穆先生都曾在江南當過中學教師。

岑仲勉先生五十二歲時從聖心中學教師轉變成為史語所研究員，除了諸位大家的獎掖外，與仲勉先生中年崛起的驕人學術成就有關。

二、“仲勉早歲學殖荒落，中年稍振刷，視蘇老泉已瞠乎其後。”

作為一位自學成才的史學大家，仲勉先生是如何從中年崛起的呢？首先是對清學的繼承。勞格“實事求是，多聞闕疑”八個大字是清學中唐史研究學術理性精神的概括。仲勉先生謂徐松《登

科記考》三十卷，“搜采極勤，與勞格、趙鉞合著之郎官柱考同為研唐史者必備之書。”仲勉先生對清學中的唐史學情有獨鍾：

1. 在清人“實事求是”的實學精神鼓舞下，對全唐文、全唐詩、金石、文集、姓氏之文、行第、地志做了全面的整理工作。

2. 在清人“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的理性精神鼓舞下，發掘了大量革新人物，如陳子昂、李德裕、王涯等，改變了司馬光的一些成說，如對牛李黨爭問題，指出李氏無黨。

3. 繼承西北史地之學餘緒，對漢書西域傳、突厥史、中亞史、中外交通史、元史均有建樹。

4. 中年以後三十年間得一千萬字，每日堅持寫一千字，所以傅璇琮先生盛贊仲勉先生是一位勤勉的學者，極重效率，且天賦極高，又善於利用助手，其經驗值得總結。

三、“一九三八年入滇，……八、九月間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初與陳寅恪兄會面，渠詢余近狀，余以擬輯唐人行第錄對。”（岑仲勉：《唐人行第錄》第三頁，《自序》）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陳寅恪先生致陳垣先生信，略云：“岑君文讀訖，極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祇有南學，江淮已北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陳垣來往書信集》第三七七頁）

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曾經肯定了岑仲勉先生的《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一文，肯定此誌乃一偽撰之文，並指出前人因未曾質疑而致解釋上“扞格而不能通”（《元白詩箋證稿》第三二〇頁）。

岑仲勉先生《〈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有云：陳寅恪兄曾謂“巴蜀遊蹤之說，實則別無典據”，“遇李回於荊州之說，亦非有佐證”。

仲勉先生對此說極為首肯，並著《平質》一文，對馮氏之說“詳辟之”（《岑仲勉先生史學論文集》第四九六頁）。由此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學術影響的脈絡。

因此，我們可以負責任地說，岑仲勉先生早年曾受到陳寅恪先生獎掖和學術影響，儘管在唐史具體論斷上與陳先生有所討論，但一直保持着對寅恪先生的敬重。

四、“沙畹氏著《西突厥史料》……說明東羅馬與西突厥之交際，尤於中古之經濟、外交史上，惠吾人以價值無比之解釋……唐代突厥回紇何為急急以馬易帛？歷史直未發覆……我國皇華商隊遠出異域者，自古絡繹於途，然卒未有能採訪漠北人經營絲絹之事實，供本國參考，而終待沙氏言之……”（《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自序）。

一九三四年發表《漢書西域傳康居傳校釋》（《輔仁學誌》第四卷第二期），指出了前人將“康居”與“康國”混同的問題。在西北史地研究中，《談〈西遼史〉書所見》和《〈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是有代表性的名篇。

仲勉先生一生未能前往西域，然而對《辛卯侍行記》一類遊記爛熟於心，因而在西北史地研究中以頑強精神取得了驕人的成果。

五、“吾國學術界流傳一錯誤觀念，迄今莫能廓清，致為文化進步之大礙，則所謂‘為賢者諱’是也。”

“然僚友中如董作賓、向達、馬元林，則因我的看法，討論與友誼，應截然分為兩事也。”（見《學原》載《關於賈島年譜的討論》）

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仲勉先生最早發表的專著為《佛遊天竺記考釋》（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向達先生於《大公報圖書副刊》撰文表示質疑（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有岑仲勉先生答辯及向達先生《答岑仲勉先生》，岑先生又有《〈佛遊天竺記〉名稱之討論》，一九六二年刊於《中外史地考證》一五一—一六三頁。

直到一九八五年章巽先生出版《法顯傳校注》稱：“《法顯傳》在歷代著錄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稱，如《出三藏記集》卷二作《佛遊天竺記》一卷”（第五頁），“《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及《太平御覽》卷六百五十七所引之《佛遊天竺記》，其中所載佛上剎利天一夏為母說法云云，也和今《法顯傳》，僧伽施國一節中所載者相似。由此看來，《佛遊天竺記》和《歷遊天竺記傳》應當即是一書”（第七頁）。

六、從《隋唐史》等書看岑仲勉先生的學術影響

近二十年來，中國學術界中研究唐代文學的杰出學者，對仲勉先生的學術遺產高度重視。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

年版)第十九頁指出：“如岑仲勉先生……有時涉及到(科舉)這方面的問題所表示的見解，是足以使人啓發的。

傅璇琮先生在《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中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牛黨重進士科，代表‘寒門’，李黨重門第，代表山東士族，前者進步，後者落後甚至反動。岑仲勉先生不同意這種觀點，在他所著的《隋唐史》、《唐史餘瀋》、《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中曾例舉事實，說明上述論點並無材料依據。近些年來，史學家對李德裕則傾向持肯定態度。”又在《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四頁指出：“從資料考據的角度說，岑仲勉先生的書對我尤有幫助。這真是一位勤勉的學者，他的著作中材料的豐富是使人獲益不淺的。我覺得，對唐代的研究，史學方面的成績要比文學方面大得多。”(“史學方面的成績比文學方面大得多”，這是一九七八年說的話，二十年後，情況轉變，近二十年來，唐代文學方面的成就，如程千帆、傅璇琮、項楚、陳尚君諸先生，其成就值得唐史學研究者刮目相看，應致禮再三，好好學習！)

陳尚君先生最近在《唐代文學叢考》中指出：“近人岑仲勉撰《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後收入《唐人行第錄》時簡稱《讀全唐文札記》)，沿勞氏之例，“就小傳人名、官爵、郡縣、年月等數類等……，復得三百十條。”(第四九七頁)又云：“筆者近年因從事哀聚唐人遺文之役，廣涉文獻，偶有所得，即為僉出。數年之間，得唐人遺文逾六千篇，已別編為《全唐文補篇》一百六十卷，交中華書局梓行。其可訂《全唐文》之誤者，乃草成此文。稱‘再續’者，一為體例仍沿勞、岑二家之舊，二以二家已考者，一般不復絮及。”(《唐代文學叢考》第七十九頁，《再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又寫道：“自劉師培《讀全唐詩發微》、岑仲勉《讀全唐詩札記》、聞一多《全唐詩校讀法舉例》發表後，《全唐詩》存在的問題日益為世人所共識，改編或重編《全唐詩》之議也隨之而起。”

岑仲勉先生的學術遺產，得到唐代文學研究新銳的發揚。我們今日出版此書，就是要表達一種心願，我們作為仲勉先生故鄉的後學，應該學習這種精神，急起直追，繼承和發揚仲勉先生優秀的學術遺產。

目 錄

重校《貞觀氏族志》敦煌殘卷	1
依唐代官制說明張曲江集附錄誥命的錯誤	22
論李德裕無黨及司馬光修《唐紀》之懷挾私見	37
從王渙墓誌解決了晚唐史一兩個問題	50
金石證史	62
貞石證史	90
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	205
元和姓纂所見唐左司郎官及三院御史	284
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蹟	327
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	348
《文苑英華辨證》校白氏詩文附按	469
《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	475
外蒙於都斤山考	510

重校《貞觀氏族志》敦煌殘卷

此敦煌殘卷見《北平圖書館館刊》六卷六號。一九三六年初，余校《元和姓纂》，偶取讀之，訛闕頗多，費數日功爲作《校記》，刻於《中大史學專刊》二卷一期。彼時寄寓鄉僻，無圖書可假，呈功有限，後來得乾隆癸丑化龍池本《太平寰宇記》（簡稱化本）、嘉慶八年刻《太平寰宇記》（簡稱嘉本）、《古逸叢書·太平寰宇記缺卷》等參合比勘，將舊稿重新改寫，比前校略有進益，然疑難之處，仍未能通告解決也。

陽郡三姓并州儀 景 魚

《寰宇記》四〇并州晉陽（嘉本脫陽字）郡三姓，魚、儀、景；此卷“陽”上奪“晉”字。但《寰宇記》四三又著晉州晉陽郡二姓，習、景；按同一姓可以分見兩郡，但同一晉陽郡似不應分隸并、晉二州，考《姓纂》景姓望有平陽，習姓望出襄陽，《寰宇記》此條當有錯誤。

雁門郡三姓岱州續 薄 解

《隋書·地理志》：“鴈門郡，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爲代州。”岱當作代。《廣韻解》云：“晉有解狐、解楊，出鴈門。”《姓纂》六：“唐御史大夫濟南男解琬，鴈門人。”

太原郡十一姓 × × × × × × × 郝 溫 閻 鮮于 令狐 尉 ×

《隋書·地理志》：“太原郡，後齊并州。”側注闕二字，當是“并州”，《寰宇記》四〇亦稱并州太原郡十一姓也。又《記》之十一姓

爲王、武、郭、霍、廖、郝、溫、閻、咎、令狐、尉遲；按太原以王爲最盛，《姓纂》武、郭、郝、溫均著太原之望，《姓氏書辯證》（簡稱《辯證》）二〇：“唐貞觀所定太原十姓有閻氏。”又《廣韻》十五清“令·漢複姓有令狐氏，……自漢已後，世本太原。”依前各引文，則前頭所闕，補入王、武、郭三字，末文尉下補遲字，均無疑問。霍，《姓纂》雖祇著河東，但與太原相近，似可照補。（《辯證》三八云：“霍，唐貞觀所定果州武都郡七姓，一曰霍氏。”可參考。）各姓氏書多言廖出南方，獨《姓纂》二十九篠“蓼，……太原，皋陶之後封蓼，以國氏焉，唐有羽林將軍晉陽公蓼崇業”。唐代封爵之號，率依其鄉土，則太原之姓當爲“蓼”而非“廖”，《寰宇記》訛也。復次，《寰宇記》無鮮于而有咎；考《辯證》九“唐貞觀所定高陵郡五姓，其一曰鮮于氏”（說見後高陽郡）。同書二八“咎，……望出太原及彭城”。則此本“鮮于”字當誤，應校改爲“咎”（音子感反），仍足成十一之數。

中山郡一姓恒州甄

《寰宇記》六一鎮州中山郡五姓，旻、甄、焦、楊、藺，鎮州即恒州改名。按《姓纂》謂甄爲中山著姓，《廣韻》十一真“甄出中山、河南二望”，則殘卷當無誤。宋本《辯證》稱藺望出中山，惟焦、楊二姓，各姓氏書均不言望出中山；又《廣韻》不著旻姓，惟《姓解》一言吳氏見《姓苑》，《路史·前紀》九又引吳氏出《風俗通》，依此思之，疑《寰宇記》原文有誤。

上黨郡五姓潞州包 鮑 連 赫連 樊

《寰宇記》四五潞州上黨郡四姓，包、鮑、樊、上官；計包、鮑、樊三姓相同，《辯證》一一亦著上黨包氏。惟本卷五姓，《寰宇記》四姓，數目有異，又本卷之連及赫連，《寰宇記》之上官，姓氏書皆不言望出上黨，是非所在，尚難懸斷。

康平郡四姓冀州宋 焦 啖 游

《通典》一七八“後魏爲廣平郡，後周置洺州”。唐無康平郡，冀州者上推《禹貢》而言。《姓纂》宋、游二姓均著錄廣平之望。此

條不見《寰宇記》。

渤海郡四姓冀州吳 歐陽 高 刀

《寰宇記》六三渤海郡三姓，吳、高、歐陽；按《姓纂》吳及歐陽，《廣韻》高，均著出渤海。又《廣韻》三蕭“刁，……又姓，出渤海，……俗作刀”。刀應正寫爲刁。

高陽郡四姓冀州紀 公孫 耿 夏

《寰宇記》六三高陽郡五姓，許、紀、夏、伏、公孫；比此卷多一姓。按《姓纂》言許出高陽北新城縣，則本卷奪許姓無疑。此外耿、伏二字字形相近，何者爲正，待考。

上谷郡四姓燕州禘 榮 侯 麻

上谷雖屬燕國，但其地未設燕州，疑與前數條相同，燕爲冀之訛。舊稿誤禘爲祫字，今據《姓解》三，知禘爲“寇”之別體，《姓纂》寇、侯均出上谷也。此條未見《寰宇記》。

范陽郡三姓幽州盧 鄒 祖

此條亦未見《寰宇記》。《姓纂》盧、祖均有范陽之望。

清河郡七姓貝州崔 張 房 向 傅 路 勒

《寰宇記》五八清河郡六姓，崔、張、房、向、傅、靳；比此少一姓而無路，又向作尚。按《姓纂》，崔爲清河著姓。《辯證》三引唐孔至《姓氏雜錄》“唐初定清河張爲乙門”。《廣韻》房姓出清河、濟南、河南三望。《辯證》三〇“清河傅氏出自後漢漢陽太守壯節侯變”。又《姓纂》“平陽，漢扶離侯路博德始居平陽，今隸貝州”。則本卷有路姓者是。惟姓氏書都不言向出清河，《辯證》五三云，“尚，……今望出汲郡及清河、上黨”，則“向”應依《寰宇記》正作“尚”。最末《辯證》五云：“唐魏鄭公定天下諸州姓譜，以崔、張、房、何、傅、靳爲貝州河郡六姓”，似作靳者是，但“何”字又訛。